



# 千禧年的感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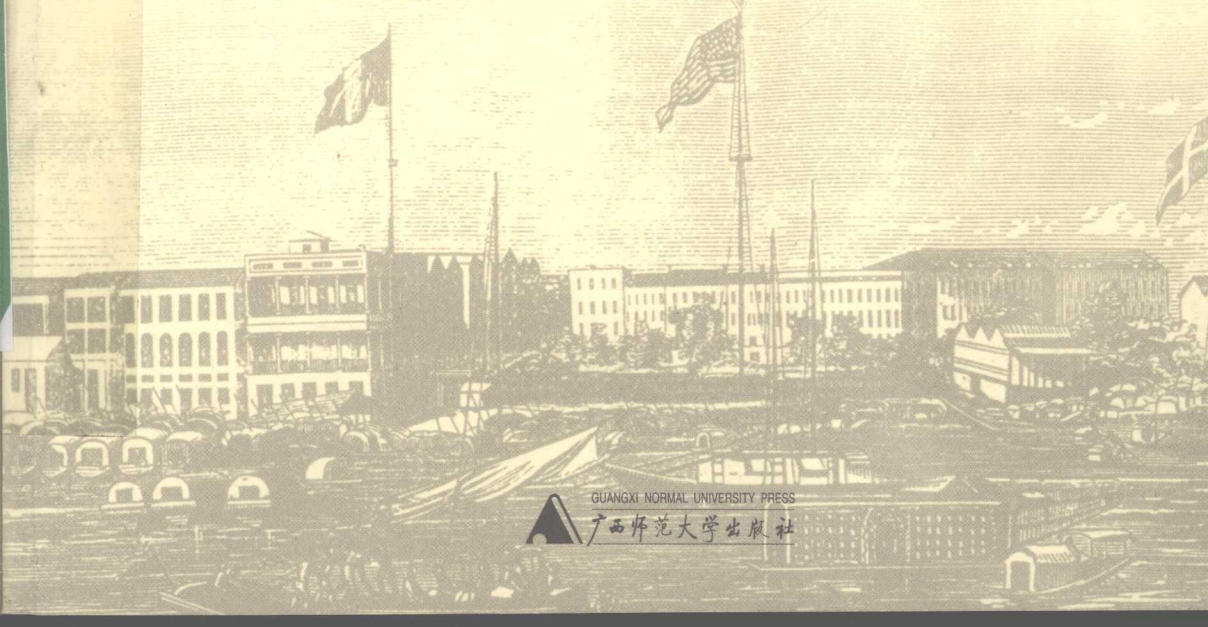
——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

[美] 雷孜智 (Michael C. Lazich) 著

尹文涓 译

QIANXINIAN  
DE GANZHAO

丛书主编 周振鹤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 雷孜智

(Michael C. Lazich) 著



# 千禧年的感召

尹文涓 译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 /  
(美) 雷孜智 (Lazich, M.C.) 著；尹文涓译．—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 / 周振鹤主编)

ISBN 978-7-5633-7471-7

I. 千… II. ①雷…②尹… III. 裨治文—传记  
IV. B979.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128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  
(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

出版人：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23.75 字数：340 千字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5 000 册 定价：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序言

周振鹤

传记就是历史。中国的廿四部正史，全部是纪传体体裁，大致由本纪、列传、表、志四类不同形式的文字组成，其中列传主要就是历史人物的传记，占了所有正史里的最大分量。本纪则是帝王的活动记录，也可以视为他们的传记。所以我们不妨可以说历史主要是由传记组成的。人是历史活动的主宰，所以人的传记自然就是历史的最主要组成部分。西方的情况与之相类似，用历史学家 Heinrich Simon 的话说，传记是最好的一种历史。一个人的生活如果袒露在我们面前，那么他所思想和他所做的一切，就给我们一个对他所处时代的历史的较好的领悟，比其时所有总的记录可能给我们的还多。因此重视传记就是重视历史，阅读传记也是阅读历史。这就是出版这套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在学术上的一般意义。

这套丛书还有其特殊意义。那就是从晚明以来的天主教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有其特殊的地位。可以笼统地说，晚明以来到达中国的西洋人主要有三种：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三是外交官。但从晚明到清代中期，能深入内地，能深入宫廷与民众之中的人只有传教士，甚至在乾隆年间严禁传教的情况下，依然有许多传教士秘密进入内地。而商人历来只能活动于澳门与广州，有时再加上其他一些沿海港口，至于外交官则只有使团性质的短暂停留。晚清以后，商人与外交官的活动显著加强，但传教士来华的活动则更加公开也更加深入，其影响程度依然远在外交官与商人之上。

与此同时，传教士中的佼佼者或者知名度较高者，其主要功绩或在历史上的重要表现并不在传教的成绩方面，而在于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特殊贡献，或在中外关系史方面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有好有坏）。他们在中国登堂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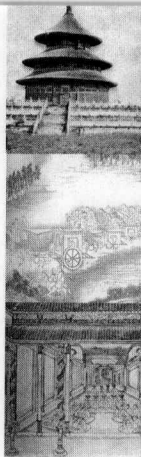


室，不仅影响一般人的普通生活，甚至还参与了中国的政治生活，干预了中国的外交活动。其中有不少人或者留下重要著作，或者介绍中国文化于西方，或者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于中国。有的甚至成了汉学研究的先驱或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虽然传教是他们的最重要使命，但其实有的传教士在这方面完全乏善可陈。例如德国的传教士卫礼贤就曾经说过，他在中国从未成功劝导过一人入教。所以无疑地，通过阅读传教士的传记或与传记相关的资料，我们又无异于在加深对中外关系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了解。

当然，传记并不总是全部可靠的。因为写传记的人与传主的关系可能会影响传记的可信性。与典章制度的记载不一样，历史上这方面事实基本上是秉笔直书的，但人物传记不同，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在中国都是儒家的教导，在外国也未必不如此。加上私人之间的恩怨或利害关系，就使得传记会有不实的成分。同时传记也不好写。不好写是因为除了叙述事实以外，还要对传主有所评价。而历史人物的评价始终是历史研究中的难题。对于大部分的历史人物很难有一个大家公认的评价，甚至是最公认的雄才大略的爱国者或是臭名昭著的卖国贼，也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历史人物的所谓定评还可能随时被推翻，而作翻案文章也始终是最有卖点的工作甚至是特别的成就。而如果这些传记牵涉到来华的外国传教士，那么问题就更加复杂。

基督教入华有过四次间断的过程。其中后两次，即晚明至清前期天主教传教士，以及19世纪以后新教传教士更为重要。直到1949年以前，在华的外国人中，仍以商人、外交官与传教士三种人为主，其中传教士的数量最大，如果倒退到晚明清初，绝大部分在华的外国人差不多都是传教士。无论明清之际或晚清，这些传教士在中西关系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有的甚至起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所以很自然地，在汉学领域里打先锋的都是传教士，无论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是如此。传教士的第一目的自然是传播基督教义，但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首先必须贡献中国文化所欠缺的东西，才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于是西方的科学与文化就成为传教的媒介。为了传教他们还必须学习甚至精通中国语言文字，他们也由此理解与研究了中国积淀数千年的丰富博大的文化，在17世纪与18世纪之时，他们将这一文化的详情（有时不一定是精髓）以各种方式传播到欧洲去。当时的传教士研究中国有一点为艺术而艺术的味道，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其有何实用价值。当然他们也有所图，那就是在欧洲文化出现危机时，试图以中国文化来济欧洲文化之穷。虽然这只是一种愿望，但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的课题。

当法国在1815年正式建立起汉学讲座，标志欧洲汉学研究的纯粹学术化，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变成一门学科的时候，其实是传教士奠基了两百多年中国



研究以后的必然结果。同样英美等国汉学的建立，也是新教传教士筚路蓝缕的结晶。这些传教士不但是开路先锋，而且本身具有很好的素养与研究成果。在中西文化交流史方面，我们不能无视传教士的功绩与影响。除了学术方面，清初的传教士还影响到中国的宫廷生活甚至皇帝的某些决策，在晚清则甚至干预到中国与列强的关系，有的传教士的确在中外关系史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所有这些都应该得到很好的清理。而传记的写作与翻译就是这种清理工作的具体体现。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学术上对传教士并没有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所有传教士都被视为文化侵略者，尤其是新教传教士大多是在鸦片战争后偕枪炮俱来，除了文化侵略以外，还被看成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凶。近些年来，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进展，但又出现另一种倾向，似乎所有传教士都完美无缺，都是中外关系与中外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实际上，这样两种倾向都缺乏历史理性，也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为了正确地认识传教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做一些基础性的建设工作，也就是将四百年来的传教士的活动进行具体而微的研究，而不是大而化之的空论，而其中最直接具体的莫过于传教士传记的撰写，将每个传教士的言行完整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一工作西方学者已经走在我们前面，因为他们有资料方面的优胜条件。虽然西方学者的这些传记未必尽善尽美，但在我们未曾有自己撰述的新传记以取代它们时，我们不妨先将这些传记翻译过来，以作为我们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实际上，由于这些传教士的主要传记资料都在西方，所以即使我们有意重写这些传教士的传记，我们也不得不大量依靠西方的文献资料。

对于晚明清初天主教士的传记，已经有人进行过很好的研究，有些已经翻译过来。而对于新教传教士，因为禁忌较多，半个世纪以来，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即使早有传记行世的，也始终没有人进行翻译。例如作为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丁韪良，他的自传性质的《花甲忆记》，就始终没有全译本。对于第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虽有不只一种传记译本，但对其夫人所编辑的保持原始资料较丰富的《马礼逊回忆录》以及《卫三畏生平及书信》也始终无人译出。基于以上种种原因，这套丛书的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坚持将尽可能原始的材料翻译给那些没有太多时间去找原著，或读原著比较费时费事的读者。选取的原则首先是以本人的回忆录或书信集为主，其次是他人所写的传记。传记里头又以作者为传主亲近者为先，其次才是专家所写的学术或思想评传。目的不为别的，主要是为了先把比较原始的资料呈现给大家，而暂不作任何评论。如果要说的话，也是由读者去做，译者与主编者并不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任何高明于读者之处。这就是编辑这套丛书的宗旨。而且这样



做对历史研究还有一些明显的好处，因为越是原始的材料往往越能够体现历史的本来面目。例如本丛书中的《卫三畏生平及书信》就比较直接地暴露出了卫三畏的一些殖民者的观点与行为，其中对中国人的蔑视、提倡侵略中国的必要，都是通过他自己的书信表现出来的，让我们更能充分认识其人的全貌。也许今天的学者为其写传记，担心触怒中国人民的情感，倒可能删去一些内容，这反而掩盖了历史的真相。这就是我们尽量选取原始的传记资料的另一个原因。相信读者是不会以为译者、主编者与出版社同意或赞赏传记中所呈现的传教士的错误观点与行为的。

宗旨确定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却遇到一些具体的困难。荦荦大者有二：一是传记原著本身的不足。有的传教士很有名，但却没有人为他们写传记，如傅兰雅，如伟烈亚力，都是19世纪来华的鼎鼎大名的学者，而且对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民有深厚感情，但在西方至今未有一本传记问世。傅兰雅，还有人为其做了一本类似年谱长编的未出版的稿本，而关于伟烈亚力，则只有一些纪念性文章而已，颇令人感到遗憾。二是难译。难译主要不体现在原文的艰深，而是复原的难度。中国的人名、地名、职官名与其他专用名词从西文回译到中文，有时要费很多的时间与精力。如丁韪良在《花甲忆记》里头提到某天总理衙门的三位值班大臣时，说他们分别姓xu（阳平）、xu（上声）、xu（去声），乍一看，会以为丁是为了说明汉字四声读音之难而编出来的，未必真有其事，而且前两个音可以复原为“徐”与“许”，第三个拼音则颇费踌躇，后来查了当时的文献，才知道确有其人其事，第三位是蒙古族，其名字头一字是“续”。这查核文献之工夫有时比翻译本文的时间还要费得多。所以译者不但要精于西文，而且要熟悉中国历史文献与历史事实，才能使传教士传记达到杰出的翻译水平。

所幸这一丛书的头三本，即《花甲忆记》、《马礼逊回忆录》与《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都有很好的译者，他们不但英文功底深厚，而且对所译传记的传主都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过有关的专门的论著。在译作如林的今天，读者一定会对他们的翻译水平作出正确的评价。

## 原版序言

中国传教史和中国基督教史这两个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雷孜智(Michael C. Lazich)博士关于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的评传从很多方面而言都是这一领域的一个重要贡献。

首先,本书是迄今为止学界对裨治文这位美国在华新教事业奠基人的唯一的全面的评述。目前,有一系列著作探讨了英美在华开创传教事业的头四十年的活动,其中之一就是拙著《英美在华传教事业的起源》(Murray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Scarecrow Press, 1996),另外还有几种则是关于英国伟大的新教传教士先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研究,譬如,香港浸会大学的巴顿·斯塔(Barton Starr)目前正在编撰马礼逊的档案。此外,还有诺曼·格拉多特(Norman Giradot)新近为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传教士以及后来的牛津大学汉学家理雅各(James Legge)的学术生涯所撰写的评传,最近还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理雅各在华南的传教活动的文章。爱德华·吉利克于1973年所出版的《伯驾与中国的





开放》(Edward V. Gulick,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所探讨的则是曾和裨治文一起工作过的伯驾。然而,无论是裨治文还是他的伙伴——和他一起出版过《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学界迄今为止尚未对他们进行过任何全面的评述。唯有龙夫威(Fred Drake)曾撰写过几篇关于裨治文的文章,本人亦曾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发表过几篇关于卫三畏的生平及其宏篇巨著《中华帝国》(*The Middle Kingdom*)的文章。雷孜智这本书关于裨治文及其作为传教士榜样的重要贡献的研究,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

雷孜智是将裨治文置于其时代宗教背景以及他所受到的爱德华兹/霍普金斯派(Edwardian/Hopkinsian)的“无私的仁爱”(disinterested benevolence)这一神学理论的感召下进行考察的。本书第一章精彩地概括了这一神学理论的背景及其发展为传教理论(也就是当今学者所谓的传教学)的过程。霍普金斯派的神学观具有美国特有的乐观主义精神,本章脉络清晰地勾勒了这一具有强烈情感冲动的特质与其如何被那些创建了美部会、后来成为其领袖和成员的人付诸实践的过程,以及随后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和神学根源。本章还介绍了裨治文的成长背景,以及他为这股奠定了他一生的事业的宗教潮流所感召的过程。

本书接下来的几章精彩地再现了美部会在华传教站头几十年的活动情况。这几章生动地描述了当时侨居广州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团体的生活,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当时中国广州城墙外以及十三行的活动情景图。作者还深刻地透析了马礼逊、伯驾(Peter Parker)、卫三畏、史第芬(Edwin Stevens)和郭士立(Karl F. Gutzlaff)等另外几位重要传教士的人物性格,并将几位著名的商人与鸦片贩子也搬上了这个在华外侨生活团体的场景。为建构这样一个宏大的场景,作者充分借鉴了雅克·唐斯(Jacques M. Downs)、彼得·费伊(Peter Fay)和乔纳森(Jonathan Goldstein)等学者关于中国鸦片贸易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还参考了爱德华·德拉罗(Edward Delano)、亨特(William Hunter)等与传教士同期在华的商人关于旧中国的描述。与此同时,作者还细致地梳理了美部会的原始档案和贝尔切城历史学会(Belchertown Historical Society)档案中关于裨治文的个人

材料。作者的叙述逻辑清晰,从容不迫地将各个历史事件和问题一一展开。值得一提的是,从书中所涉及的关于中国历史的多个方面的探讨中,雷孜智同时还向我们展示出了他在这方面的丰富知识。实际上,早先的传教士传记和传教史研究大多没有将其研究对象置于中国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

本书涉及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那几章尤为可贵,因为近来的学术研究甚少关注鸦片战争期间及此后几年间在华传教士的活动。这几章考察了裨治文参与中美政治外交和翻译《圣经》的活动。作者再次发掘、利用了大量关于美国在华传教站的原始文献,这一章关于译名之争的资料尤为详细。

本书的最后几章也异常精彩。这几章勾勒了上海在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之前的场景。雷孜智向我们展现了裨治文细致的观察力及其在汉学方面的成就,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裨治文的局限性,囿于其时代背景,裨治文不可能对他所要努力去救赎的中国抱有很正面的观感。

雷孜智是一个精巧的艺术家,全书行文极其清晰而细腻,他对文献的运用和细致的分析展现了他高超的组织材料的能力,而他流畅的叙述则绝不会让读者有为材料所累或流于空泛之感。

本书涉及多个学科领域,中国历史、传教史、基督教史以及中西关系史等领域的学者都会看到本书的新颖和重要之处。本书同时也是中美关系史和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贡献。雷孜智教授这本书所考察的不仅是一个人、一个时代,而且是异文化间的一次重要对话。这本厚重的学术著作可与 Kathleen Lodwick、魏扬波(Jean Paul Wiest)、鲁唏珍(Jesse Lutz)等其他中外学者的成就比肩,他们一道为让我们更多地认识到传教士在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张格物(Murray A. Rubinstein)  
CUNY-Bernard Baruch

## 原版谢辞

在此,我要对所有为本书的研究和撰写提供了帮助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首先,要感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 Roger DesForges 教授在本书尚为博士论文阶段时所给予的宝贵指导和建议,他耐心的指教与严格的态度永远值得我仿效。同时,我还要衷心地感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 John A. Larkin 和 Georg Iggers 教授给予我的可贵意见与热心支持。

在我为本书研究、查找各种信件、日记等原始文献的过程中,有诸多人给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其中,我要特别感谢贝尔切城历史学会的 Doris Dickinson 女士、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 Martha Smalley 女士以及哈佛燕京学社的 Timothy Conner 先生。

最后,我要向 Fred Drake、Murray Rubinstein、David Mungelleo 和 J. Barton Starr 几位学者致以深切的感谢,他们通读了本书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我还要谢谢他们所给予的热心鼓励。当然,本书如有错误或遗漏之处,责任完全在于本人。

## 中文版序

随着 21 世纪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崛起,中美早期关系史日渐成为学者与外交家们感兴趣的重要研究领域。人类文明史上最古老的文化大国与最年轻的国家之间所发生的文化和政治上的最初接触及进展,无疑是 19 世纪最令人瞩目的历史事件之一。美国传教士在这段中美关系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作为早期的汉学家和文化传播者,他们不仅努力将中国的历史、文化介绍给了英语世界的读者,同时,他们还协助西方外交使节摧毁了阻碍中西文化与物质自由交流的屏障。当然,传教士们的首要目标是将他们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传播给中国人,从这个角度看,他们的传教活动无疑是自负地将西方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异质文化。

对于传教士在中西关系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其固有的矛盾和双重性,是长期以来令研究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西方学者困惑的一个难题。毫无疑问,对基督教事业的认同使得他们更倾向于强调传教活动的积极因素,并将此视为现代化进程和人道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蔓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值得称道的环节;但另一方面,那些对基督教在世界历史上的作用持批判的态度的学者则倾向于将



传教士描述为政治与文化上的帝国主义分子,认为他们是西方政府武力外交和经济掠夺的无耻帮凶。这本关于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的研究著作,在尊重以上两派的基础之上,试图对这位美国传教士的生平事业进行客观而中允的评价,他是美国传教士中最受人敬仰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裨治文是美国早期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人和关键人物,同时,在他于1861年逝于上海之前,他也是美国最重要的“中国专家”,因此,他作为主要顾问与翻译参加了早期美国派往清政府的外交使团的活动。

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是美国文化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强大影响。随着中国朝着经济增长和全球化进程的稳步发展,如何理解文化交流在中美历史关系中的微妙作用,则日益成为中美学者需要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

本书译者尹文涓能认识到本书的研究对于深入探究中美之间跨文化对话的价值和意义,在此我要对她致以最衷心的感谢。文涓的才华和学识,她本人在传教士研究领域的丰富积累,以及她出色的英语能力,都使得她尤其胜任翻译这卷关于裨治文生平的著作的工作。中文译本体现了她可敬的才华与对本书的充分理解,我衷心期望这一切都能为中文读者所欢迎和赏识。

雷孜智

# 目 录



丛书总序 / 周振鹤	1
原版序言 / 张格物	1
原版谢辞	4
中文版序 / 雷孜智	5
引言	1
第一章 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	9
第二章 在华基督徒协会	54
第三章 实用知识传播	98
第四章 鸦片、政治和福音	143
第五章 传教士外交：服务政治的诱惑与危险	180
第六章 上帝的形象：译名之争	218
第七章 华北传教站：上海 vs. “天京”	254
第八章 传教士外交：已成就和未实现的千禧年之约	296
参考文献	335
专有名词中英对照表	350
译后记	363

## 引 言

凡是涉猎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人都必然清楚耶稣会士在促进西方世界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方面的重大贡献。邓恩 (George Dunne)、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孟德卫 (David Mungello)、孙尚扬等学者对利玛窦以及 17 世纪其他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在汉学和文化传播方面的成就作了深入的探讨。然而,迄今为止,学界对 19 世纪初来华的第一批新教传教士却一直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正如那些耶稣会士前辈一样,这些来华的新教传教士极大地扩充了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认知,并且向中国传播了大量关于西方文明的信息。除此以外,他们还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第一批外交条款的谈判,从而为一个政治接触和文化交流激增的时代拉开了序幕,这也正是令人们对他们的评价毁誉参半之处。

裨治文是早期来华的最重要的新教福音传教士之一,同时也是美国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他受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 (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 下文简称美部会) 派遣,于 1830 年抵达中国南部的港口城市广州,在那里学习中文和研究中国文化,以期为将来美国传教事业的扩展奠定根



基。裨治文幸而与早在 1807 年来华的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为伴,并在语言学习方面得到了后者的指导。在纽约富商奥立芬(D. W. C. Olyphant)的资助和支持下,裨治文与马礼逊尝试了多种在中国人当中传播基督教的策略,与此同时,他们还为了唤起西方人对这个在他们看来是世界上最有前途的传教领地的更多兴趣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在鸦片战争(1840—1842)前,由于清政府严格限制外国人在广州的活动,那时在华的新教传教士不到 5 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传教士在形塑西方人关于中国社会的观感和对中西外交关系的影响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裨治文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他不仅最先向美国读者传递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而且同时将西方世界的历史和文明介绍给了中国人。在这一点上,他继承和拓展了两个世纪前在华耶稣会士们所大力推行的东西文化交流。

孟德卫的《神奇的土地:耶稣会士的调适策略与汉学的起源》(*Curious Land: Jesuit Accomodation and the Origins of Sinology*, 1985)一书是关于在华耶稣会士研究的优秀著作之一,该书探讨了耶稣会士在拓宽欧洲知识分子的视界和西方萌发早期汉学研究方面的重要贡献。利玛窦以及其他 17 世纪早期来华的耶稣会士所采取的调适策略开辟了中国和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通道,从而为双方大量有用而新奇的知识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使他们赢得了中国人的尊重,并获得了洞悉中国社会最高阶层的运转的特权。同时,对中国文学和哲学典籍的潜心研究使得他们对中国人的信仰与实践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将自己的宗教及文明解释并传递给中国人。

就在欧洲社会刚从宗教分裂的阵痛中挣脱出来之际,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士大夫阶层和具有人文主义关怀的儒家传统的描述为莱布尼茨(Leibniz)、伏尔泰(Voltaire)等欧洲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也为他们抨击基督教西方世界的落后与自命不凡提供了参照。同时,耶稣会士的中文著作和译述也给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了解欧洲文化与知识传统的机会,从而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一部分人开始大胆地反省自身的文化及思想遗产。不幸的是,发生在 18 世纪初的“礼仪之争”导致中国朝廷和罗马教廷的关系破裂,也给东西文化



交流的这一辉煌时期划上了句号。由于罗马教会不允许中国教徒参与某些儒家传统中最受尊崇的礼仪,为此激怒的康熙皇帝被迫施行禁教政策,严格限制在华传教士的所有活动。

毫无疑问,此后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开启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篇章时,耶稣会士们曾经关注和困扰的很多问题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如同他们的天主教前辈一样,新教传教士觉得有必要将中国的古代历史和《圣经》的纪年关联起来,确立基督教相对于儒家传统的价值,以抗衡中国人以“中央帝国”自居,在文化、政治上都自命不凡的观念。利玛窦是通过强调文化的融合和肯定中国文化中诸多方面的内在价值来解决这些问题的。这一策略提供了耶一儒并存的可能性,从而赢得了中国士人的尊重,并开辟了一条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可行路径。

但是,在新教在华的传教事业开辟之际,塑造了当代西方人的宗教、政治力量 and 此前影响耶稣会士的因素有着鲜明的差异。新教时代的西方国家已经脱离了曾经笼罩着 17 世纪欧洲的宗教冲突和专制政治的阴影,并取得了辉煌的进步。到 19 世纪初期,英国人与美国人对他们在社会、政治和物质文明方面所取得的不断发展充满了信心,将自己视为新时代的先驱。与此相反的是,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却进入了一个衰败的阶段,尽管这个国家在清朝政府的统治下有过一段比较长的和平和繁荣时期,但是,各种恶性的因素正在严重地破坏中国社会的整体性。这个曾经让耶稣会士们钦佩不已的中国对于新教传教士而言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之处,实际上,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大部分实情只会让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西方文明的无上优越。

或许,正是早期新教传教士这种自以为是的宗教情绪,使得很多学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失去了兴趣,迄今为止,关于这批传教士的个人生平和传教活动的大部分著作均出自他们的拥趸者之手。最早出版而且资料最详实的传记合集是传教士学者兼出版家伟烈亚力的《来华新教传教士纪念集》(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1867)。该书收录了三百多名传教士的生平及其中、英文著述资料。其他关于早期新教传教